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容易”的词汇化历时考察及文化意义

姜 梦

(青岛科技大学 国际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61)

[摘要] 现代汉语中高频词“容易”古今意义不同, 历时层面上看经历了词汇化和后续语法化两个阶段的演变。东汉至魏晋时期, “容易”作为“可以轻视”义助动词短语, 固定连用于“谈何容易”为代表的四音节结构中, 唐代词汇化为一个形容词, 并通过招请推理发展出“不费力”和“轻率”义。成词后的“容易”没有停止虚化, 继续语法化为“不费力”义和“可能性大”义情态助动词, 由此形成新旧用法长期共存的局面。“容易”的历时演变过程中, 一受先秦时期形成的“易”的形容词和助动词用法影响, 二受双音节趋势推动; 直接诱因是句法环境改变所导致的原有结构的平衡格局被打破; 演变机制是类推和重新分析。“容易”的历时考察有助于推进现代汉语高频词汇的系统研究。

[关键词] “容易”; 词汇化; 历时演变; 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 H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20]04-0183-05

“容易”一词最早源于东汉文献中的“谈何容易”, 如(1)。这里的四个字均有实意: 谈, (臣子)向皇上进谏; 何, 怎么; 容, 能够; 易, 轻视。字面意思是“在君王面前谈论事情怎能轻视”, 实指臣子对皇上进谏, 言谈不可不慎重。而现代汉语中, “谈何容易”的意义已发生变化, 作为一个四字成语, 被“重新理解(reinterpretation)”为“事情做起来并不像说的那样简单”, 如(2)。可见, 最初的“容易”并不是一个词, 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经历了形式上的“重新分析(reanalysis)”, 由短语结构词汇化为了“简单、不费力”义形容词, 可标记为“容易₁”, 如(3)。

(1) 吴王曰: “可以谈矣, 寡人将竦意而听焉。”先生曰: “於戏! 可乎哉? 可乎哉? 谈何容易!”(《文选×东方朔〈非有先生论〉》)

(2) 想指着唱戏挣钱, 谈何容易呢! (老舍《兔》)

(3) 长得好很容易₁, 但有头脑就不那么容易₁。(王朔《痴人》)

此外, 现代汉语中, “容易”还可用在动词前, 作为情态助动词表示“某事做起来不费力”或“发生某种变化可能性大”, 可标记为“容易₂”和“容易₃”。如(5)、(6)。

(4) 一旦他若丢了王宅的地, 哪能很容易₁租到合适的地呢? (老舍《火葬》)

(5) 乡下的娃子是容易₂ 对付的。(老舍《牛天赐传》)

(6) 我是真爱这个小人儿, 太聪明! 聪明人可容易₃ 上当! (老舍《兔》)

以上三个例句中“容易”的用法不尽相同。(4)中“容易租到”和(5)中“容易对付”均带谓词性宾语, 表层结构一致, 但深层关系不同: 前者是限定关系, 可加“地”扩展为“哪能很容易地租到地”; 后者是支配关系, 无法扩展为“乡下娃子是容易地对付”, 只能转换为“乡下娃子对付起来容易”。说明“容易₁”仍是形容词, 此处做状语修饰后面动词; 而“容易₂”则已脱离典型性质形容词范畴, 用来表达说话人对某事做起来是否费力

收稿日期: 2019-06-15

作者简介: 姜 梦, 博士, 青岛科技大学国际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现代汉语量级含义的形式与功能互动研究”(项目编号: 17CYY035)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卓越青年教师项目“现代汉语的语义-语用接口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的评价,已获得情态助动词的语法功能。再看,(5)中“容易对付”和(6)中“容易上当”语义上均体现说话人的主观评价,但结构上所搭配谓词又有所不同:“对付”具有自主性,说话人有意施为,暗含希望完成事件“对付乡下娃子”之义;而“上当”具有非自主性和消极意味,与说话人意志无关,不能转换为“上当起来容易”,只能理解为“上当的可能性大”。可见,“容易₃”不再表示做某事的难易程度,而是体现某事发生的可能性程度。那么,现代汉语中高频词汇“容易”的这些不同用法是何时、怎样形成的?又受何种演变动因、机制影响呢?本文试图还原“容易”的历时演变路径。

一、阶段一:东汉和魏晋时期的情态助动词短语“容+易”

上古汉语中,“容”和“易”单独成词且意义丰富。根据《汉语大字典》,“容”的本义为“容纳;盛载”,此外还有“收留,宽容,允许,或许,从容”等23个义项。“易”的本义指古代阴阳变化消长的现象,此外还有“不难,轻视,轻易,改变,治理”等30个义项。^①语料调查显示,西汉之前“容”和“易”的连用只有三例,语义不固定且组合上具有随机搭配的临时性。例如:

(7)仲尼、墨翟,穷为匹夫,今谓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则变容易色,称不足者,士诚贵也。(《庄子×盗跖》)

(8)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不能则恭敬縻絀以畏事人;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妒嫉怨诽以倾覆人。(《荀子×不苟》)

(9)优贤不逮谓之宽,反宽为阨。包众容易谓之裕,反裕为褊。(贾谊《新书×道术》)

(7)中“容”是名词,和“色”对举,均指“脸色”;“易”是动词,和“变”对举,均指“改变”,意思是“改变脸色”。(8)中“容”和“易”都是形容词,分别指“容忍”、“平易”,“宽容易直”的意思是“宽厚容忍平易正直”。(9)中“容”是动词,和“包”对举,均指“包容、容纳”,“易”是名词,指“改变”,“包众容易”的意思是“包纳众物、接受改变”。可见,上古汉语中“容”和“易”是典型的实词,意义独立,用活灵活。

到了东汉,“容”和“易”的连用开始固定化,多置于表示否定^②的四字短语结构中,除(1)中的“谈何容易”外,还有“事何容易”、“亦不容易”、“不容易也”等。例如:

(10)郎中丘常谓恽曰:“闻君侯讼韩冯翊,当得活乎?”恽曰:“事何容易!胫胫者未必全也。”(《汉书×杨恽传》)

(11)为人父母,亦不容易。子亦当孝,承父母之教。(《太平经》)

(12)为人先生祖父母不容易也,当为后生者计,可毋使子孙有承负之厄。(《太平经》)

根据各家注疏对“谈何容易”的解释,这一阶段“容”、“易”二字连用但尚未成词,仍是一个短语结构。语义上可分析为“容”、“易”意义的线性叠加,即“可以轻视”之义,“何容易”、“不容易”指“岂能轻视”、“不能轻视”。值得注意的是,“容易”前的主语可为名词“谈、事”,或为代词“此”,也可为句子整体“人居世间、为人父母”,但其担当的论元角色均是“易”的受事,指“某一具体事情不能轻视”。总之,“容”和“易”最早固定于以下否定祈使句式:

句式1:[NP/S]_{受事}+neg.+[容+易]

那么此时“容”、“易”的语法身份是什么?短语“容+易”内部的深层结构关系又如何理解?晁瑞(2007)曾指出这里的“容”为“容许”义动词,“易”为“轻易”义形容词。^③但根据我们的调查,“易”作“轻易”义形容词时,指行为或态度“简慢、轻率”,多用作状语修饰、限制动词,未见出现于动词宾语位置上的例子。故本文认为此处更适合将“易”分析为“轻视”义动词,与“容”构成连动结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容”存在两种理解,若以“谈何容易”为例,“何容”和“易”前均可分析出一个空位,即“pro_i何容 pro_j易也”。“谈”不是产生于主语位置,而是从“易”的宾语位置移位上来的,由于动词“易”的主语不出现,既可把省去的主语理解为出现在原位,分析为“谈何容 pro 易 t_i”(在君王面前谈论事情怎能容许我轻视),此时“容”为“允许”义动词;也可把省去的“易”的主语理解为出现在“何容易”主语的位置上,分析为提升结构“谈,pro_i何容 t_i易 t_j”(在君王

①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933、1494页。

②“何容易”作为反诘形式意义上相当于“不容易”,说话人心理层面上已有主观倾向,选用疑问词“何”只是为了强调自己的意图,加深否定的效果,可看作为一种内容否定或语用否定。总的来看,“何容易”和“不容易”都是用否定形式传递“不能轻视、需谨慎”的肯定祈使意义。

③晁瑞:《“容易”的词汇化语“容”表“许可”义》,《汉语学习》2007年第1期。

面前谈论事情(我)怎能轻视),此时“容”重新分析为“可以、能够”义情态助动词。^①同理,(11)中句子整体“为人父母”可理解为从“易”的宾语位置移位上来的话题,此时“容易”同样可作两解。

但与“伯勤亲供,不容得出。(东汉×县果共康孟译《中本起经》)”不同的是:“不容得出”构成“不容VP”;而“何/不容易”构成“NP何/不容易”,即结构上“容易”多出现于对称式四音节结构的后两节。另外,“何”、“容”均为平声字,其韵母都是响亮的开口元音,“易”是零声母去声字;相比之下,前两个字的音节停顿稍长,后字音节极为短促,因此“何容”的语音间隙明显大于“容易”。^②可见,相对于后面带动词短语的情况,“何/不容易”结构中“容”与单音节动词“易”的结合更紧密,更有利于成词。综合来看,本文认为将“易”省去的主语理解为出现在“容易”整体前,分析为提升结构“Pro_i不容t_i易”更适合,即短语结构“容易”中的“容”为“可以、能够”义助动词,故句式一中的“容易”可作“可以轻视”义助动词短语解。

到了魏晋南北朝,“容易”仍然出现于相对固定四音节结构和提醒某事不能轻视、需要谨慎的语境中,且使用频率有所增加。例如:

(13)侍中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从弟也,嶷与书曰:“东主初崩,帝实幼弱,太傅受寄托之重,亦何容易!”(《三国志×张嶷传》)

(14)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颜氏家训×勉学》)

(15)吾曰:“凡如此例,不预研检,忽见不识,误以问人,反为无赖所欺,不容易也。(《颜氏家训×勉学》)

(16)非渊明弘鉴,则中兴之业何容易哉!(《华阳国志×刘后主志》)

总的来看,东汉和南北朝可看作“容易”词汇化的萌芽阶段。胡绍文(2000)指出位置固定且“何”的语法功能完备为“容易”成词提供了可能。^③本文认为胡文所指仅是“容易”词汇化的必要条件,句法环境的改变和“不过量准则”语用机制的双重作用才是导致“容易”发生词汇化的直接因素。下面具体来看。

二、阶段二:唐代的形容词“容易”

到了唐代,“容易”不再仅限于“谈何容易”、“亦何容易”等否定定义四音节结构,还可以出现在三音节结构、肯定结构、NP为非受事或省略的句法环境中,当结构平衡被打破,“容”和“易”的关系更加紧密。情态助动词短语和形容词均可作谓语,随着短语“容+易”在谓语位置上使用频率的增加,“容易”逐渐发生词汇化,由情态助动词短语凝固为一个形容词,语义上发展出“不费力”和“轻率”两个义项。如可以出现在如下否定句式里:

句式 2.1: neg.+容易

(17)又时见僧云:“还知禾山恶发摩?”僧便问:“和尚无端恶发作什摩?”师云:“嗔拳不打笑面。”乃笑云:“大不容易。”(《祖堂集》卷12)

(18)转精勤,莫容易,夜靖(静)三更思妙理。(《敦煌变文集×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17)中“容易”虽然仍处于四音节结构中,但根据文意,已不是提醒某件事情需要谨慎,而是在评价“(能做到生气的拳头不打笑脸这件事情)很难”。说明“容易”结构上已很难分割,语义上也不再是“容”和“易”的组合叠加,而是凝固为一个整体意义:“不费力”义。(18)中“容易”处于三音节结构,“容”的“可以”义与“莫”的否定祈使义相矛盾,只能理解为“诵读经文要勤奋,不要怠慢”,“容易”凝固为“(行为、态度)轻率、懈怠”义。此外,“容易”还可以出现如下肯定句式里:

句式 2.2: ([NP/S]_{非受事}+)容易

(19)僧便问:“当众举扬为什摩却成返仄?”师云:“只为容易。”僧云:“不容易作摩生道?”师云:“当不当。”(《祖堂集》卷10)

(20)可中总似你如此容易。何处更有今日事?汝等既称行脚。亦须着些精神,还知道大唐国里无禅师?(《祖堂集》卷20)

(21)不精专,非志意,向佛对僧且容易;佛言彼若到来时,不要与他宣妙理。(《敦煌变文集×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22)老宿去房里,女出来相看曰:“小弟容易,乞老宿莫怪。”(《祖堂集》卷3)

^①李明:《从“容”、“许”、“保”等动词看一类情态词的形成》,《中国语文》2008年第3期。

^②李春晓:《“容易”考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③胡绍文:《谈“容易”的成词原因及时代一兼与〈汉语大词典〉“容易”条商榷》,《语文学刊》2000年第5期。

以上四例均为肯定结构,“容易”在前两例中指“不费力”义,后两例中指“(行为、态度)轻率”义。这四例结构上的共同点为:主语可以省略,即使出现也不再是“容易”的受事对象,而是与“容易”呈“主体-性质”的主谓关系。形容词的作用就是表示事物性质或动作行为情状,因此当(22)中出现描写的对象NP“小弟”时,更加突出了“容易”的形容词特质,证明“容易”已经词汇化为了一个形容词。这一点也可在“容易”与其他助动词连用的句式中得到确认。

句式 2.3:「NP/S」_{非受事}+neg.+adv.+容易

(23) 师云:“汝何不早问?”僧云:“某甲不敢容易。”(《祖堂集》卷 10)

(23) 中条件可能助动词“敢”一般不与道义助动词“容”搭配使用,语义上理解为“我不敢可以轻视”更是不通,“容易”只能作“草率”义解,意思是“我不敢草率(问您)”。

由句式一到句式二有三个变化:一、语气形式上反问否定→陈述肯定;二、音节数上固定四音节结构→三音节或多音节;三、NP 组成上[-无生性]→[+有生性]。句式一中否定标记“不”、“何”的存在是为了突出否定的内容(如“谈”所指的“在君王面前谈论事情”一事),因此最初“容易”多用来感叹某事需重视;当突出内容的需要被语境取消,句子转向无标记的肯定形式,“容易”逐渐演变为用来陈述对象特征的形容词(对无标记的追求是语言发展的根本动因,因此从有标记否定到无标记肯定也符合人类语言的宏观发展趋势)。此时,语义因素之间产生两种不同的配置和推导关系:心理期待上是说话人希望发生还是不希望发生的,词语的价值取向上是积极还是消极的,这两对因素的不同配置方式影响说话人的主观评价是正向还是负向意义。如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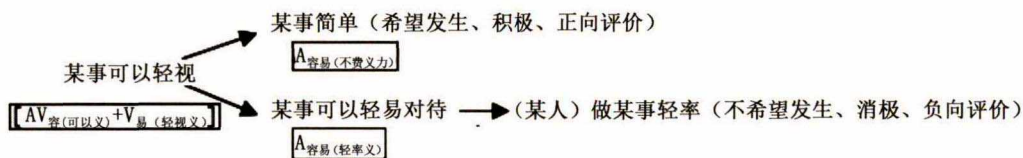


图 1 形容词“容易”的语义演变路径

“容易”的词汇化过程中之所以会产生如图所示的语义演变,是因为从“可以轻视”到“不费力”和“(行为、态度)轻率”存在着信息差,可看作一个由“不过量准则”引发的“招请推理(invited inference)”,即“可以轻视”从信息量上看蕴含“不费力”和“可以轻易对待”。故当“容易”进入肯定结构,“(某事)可以轻视”往往传递着“某事不费力”和“某人轻率”的隐含义,由此形成“不费力”和“(行为、态度)轻率”义。另外,根据“乐观假设(the Pollyanna Hypothesis)”,人类心理普遍存在向往好的一面、摒弃坏的一面的倾向。而负面消极的“轻率”态度是人们所不赞赏的,因此该意义多出现于否定语境中,用来劝诫听者对待某事不能轻率。

三、“容易”发生词汇化的前提、诱因和机制

总的来看,短语“容+易”词汇化为形容词的过程,分别伴随着“容”和“易”的语法化过程。“容”由动词语法化为情态助动词之后进一步语法化为词内语素,虚化过程中就伴随着语义脱落;“易”则由动词语法化为词内语素,且作为主要动词,“易”的词义在词汇化过程中得到了保留并成为语义主宰,因此词汇化后“容易”的意义相当于“易”的意义。而一个形式在语法化过程中伴随词汇意义丧失的现象很普遍,被语言学家们称为“语义褪色(semantic fading)”或“语义漂白(semantic bleaching)”,这种语义脱离使得原来有意义的一个字变成了一个不表义的语音符号是一个跨语言现象。^①此外,江蓝生(2017)曾提到应区分语法化的先决条件和直接诱因,如语义相宜,结构紧邻和频率只能看作诱发语法化的必要非充分条件。^②因此关于“容易”的成词原因,我们认为应从前提、诱因和发生机制三个方面来区分。

“容易”之所以能词汇化“不费力”和“轻率”义形容词,前提条件主要有三:首先,“容”与“易”线性顺序上紧邻共现的结构优势是导致其词汇化重要的前提。表层结构掩护到位,深层结构的变异才能顺利进行。加上情态助动词短语和形容词具有相似的语法功能和句法位置,为“容易”由情态助动词短语重新分析为形容词提供了可能性。其次,“易”作为形容词“容易”的语义主宰,在上古时期就已具有完备的“不费力”义和

①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92 页。

②江蓝生:《超常组合与语义羡余—汉语语法化诱因新探》,《汉语言学新视界》,学林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1-41 页。

“轻易、草率”义,且据统计出现频次不低,分别约为23次(5.1%)和84次(18.8%)^①。如(24)中,“易”常与形容词“难”对举出现,指“难”的反面意义“简单、不费力”确凿无疑。(25)中“慢”和“易”构成并列关系的形容词短语,“慢”指“傲慢”,“易”指“轻率”,意思是“没有礼貌并且傲慢轻率却想获得尊敬”。总之,先秦时期“易”这两种用法的成熟对“容易”的词义产生了重大影响。

(24)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

(25)今有人於此,无礼慢易而求敬,阿党不公而求令,烦号数变而求静,暴戾贪得而求定,虽黄帝犹若困。(《吕氏春秋·审应览》)

再次,双音化趋势推动了双音节形容词“容易”的词汇化的发生。大约从东汉时期开始,汉语词汇系统经历了规模较大的双音化浪潮。不管是语言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原因,汉语词汇系统双音节占优势已经很明显。^②而在双音节占优势的语言系统中,原本可以由单音节“易”表达的意义,在韵律环境的作用下,最终找到一个对应的双音节载体“容易”来表达。

但是,促使“容易”发生词汇化的真正的“导火索”是“容易”所处的句法环境发生变动,原有的四音节结构和语义平衡被打破。即,最初“谈何容易”所代表的否定四音节结构是常规结构式,随着“容”和“易”共现频率增加,随之产生的肯定结构、多音节结构打破了原有结构的平衡格局,成为相对而言的非常规结构式,进一步成为启动词汇化程序的诱因。最终词汇化的实现是非常规结构和语义关系新平衡的建立。而“容易”词汇化过程的机制是深层结构的重新分析和认知心理机制的作用。情态助动词“容”和动词“易”组成的不稳定的连动结构中,句法功能和语义轻重度均存在不平衡,伴随着“容”的虚化,[容_词+易_词]的深层结构重新分析为[容_{语素}易_{语素}],可见词语的词汇化往往是以结构式的语法化为依托的。同时,在“不过量准则”作用下,受连动式中主要动词“易”的语义影响,伴随着结构上的重新分析,“容易”在语义上也由各成分的叠加意义演变为新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意义。

总的来看,明代为止,“容易”一词历时演变完成。其各用法在不同时期的使用频率如下(表中明代之后的“容易”还包括“好容易”、“好不容易”等新兴构式):

表1 汉代至清代“容易”不同用法的出现频率汇总

朝代	文献	容易	短语(容+易)	A 容易(不费力义)	A 容易(轻率义)	AV 容易(不费力义)	AV 容易(可能性大)
汉	《史记·本纪》《论衡》《新书》 《太平经》	5	5
魏晋南北朝	《世说新语》《颜氏家训》《齐民要术》 《三国志》《华阳国志》《全梁文》	7	7
唐	《祖堂集》《敦煌变文》《全唐诗》 《大唐西域记》	114	.	53(46.5%)	25(21.9%)	33(28.9%)	3(2.6%)
宋	《朱子语类》(1-8册)《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宋代卷》	94	.	37(39.4%)	35(37.2%)	22(23.4%)	.
元	《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全相平话五种》 《元典章》《通制条格》	9	.	6(66.7%)	1(11.1%)	2(22.2%)	.
明	《西游记》《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	85	.	49(57.6%)	1(1.2%)	18(21.2%)	6(7%)
清	《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儒林外史》 《曾国藩家书》	233	.	85(36.55%)	2(0.8%)	30(5.1%)	19(8.2%)

由表1可知:一、“容易”的“不费力”义形容词用法产生并成熟于唐代,即使后面不断有新的用法加入,该用法也没有萎缩,从古至今都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主要用法。二、“轻率”义形容词用法从明代开始萎缩,我们推测这与明代开始同义表达“轻易”、“轻率”等词的大范围使用有关,经过竞争刷选,表“轻率”义的“容易”被淘汰掉了。三、“不费力”义情态助动词“容易”出现并成熟于唐代,“可能性大”义助动词“容易”出现于唐代,明代才得到发展。这两种情态助动词的用法与“不费力”义形容词用法共存至今,最终成为现代汉语“容易”的主流用法。

(责任编辑:刘要停)

^①本文所调查的先秦文献来源于CCL古代语料库,包括:《今文尚书》《周易》《春秋》《诗经》《左传》《论语》《公羊传》《吕氏春秋》《大学》《孟子》《谷梁传》《韩非子》。

^②王寅、严辰松:《语法化的特征、动因和机制——认知语言学视野中的语法化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